案號: 220/2008 **裁判書日期: 2008 年 7 月 10 日**

(刑事上訴)

主題:

檢察院

刑事偵查

刑事預審法官權限

扣押

《刑事訴訟法典》第 245 條第 1 款

《刑事訴訟法典》第 250 條

《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

裁判書內容摘要

一、 作為刑事偵查的領導者(見《刑事訴訟法典》第 246 條第 1 款的規定),檢察院有權決定採取或下令採取各種各樣的措施,以「調查犯罪是否存在、確定其行爲人及行爲人之責任,以及發現及收集證據,以便就是否提出控訴作出決定」(見《刑事訴訟法典》第 245 條第 1 款的規定),祇

要不涉及《刑事訴訟法典》第 250 條和續後條文所專屬保留予刑事預審法官的權限便可。

二、 就本偵查卷宗而言，檢察院曾發函法務局，以要求禁止就涉案各公司的所有權或股份的任何移轉事宜進行公證及登記行為。

三、 雖然這措施在客觀上會導致有關公司的所有權或股份不能移轉予他人，但在本上訴案中，經分析被上訴的批示內容和其內所述的案情後，本院認為如刑事預審法官本人在該批示中表明上述檢察院的禁止措施非屬《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所泛指的真正扣押行為，而祇是會在「實質上產生扣押嫌犯在有關公司所佔股的效果」，那他便不得假借《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6 款的規定，去具體審議該舉措的合法性或避重就輕地「宣告有關禁止措施不應產生《刑事訴訟法典》規定的扣押效果」。

第一助審法官

陳廣勝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上訴案第 220/2008 號

上訴人: 澳門檢察院

被上訴人: B

一、 案情敘述

2008 年 2 月 15 日,澳門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法官在第 720/2007-G 號卷宗內作出如下決定:

「本案由檢察院第 720/2007 號偵查卷宗的嫌犯 B 對檢察院 2007 年 4 月 18 日第 456/2007/KL-NIC 公函提出申訴,請求宣告檢察院禁止申訴人及其丈夫,即同案另一嫌犯 A,就案中十間公司的任何轉名事宜進行公證及登記的命令不產生效力。

檢察院認爲,檢察院依《刑事訴訟法典》規定有權作出嫌犯質疑的偵查措施,而該等措施並不屬刑事起訴法庭的專屬權限;同時,檢察院認爲,被質疑的禁止措施並非扣押措施,而是要求行政當局協助檢察院進行偵查的必要措施,故此,申訴人並無正當理由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規定向刑事起訴法庭提出申訴(見卷宗第12頁內容)。

此外,經本庭邀請,檢察院闡明,採取有關禁止措施的目的在於收集證據,以便廉政公署查明疑犯A和B的犯罪與相關公司的關係,因相應的偵查卷宗顯示

兩名嫌犯從事行賄及清洗黑錢的犯罪並可能利用其名下的公司轉移犯罪所得，爲此，檢察院經廉政公署建議，爲進一步收集證據，特別是查明兩名嫌犯有否利用相關公司實施犯罪，不排除在查明事實後，扣押涉及犯罪之財產等證據之可能性(見卷宗第1098頁)。

***

依照本案資料，檢察官閣下在2007年4月18日在第720/2007號偵查卷宗作出批示，要求法務局採取緊急措施，禁止對嫌犯A和B在C國際置業有限公司、D建築置業投資有限公司及E投資有限公司的任何轉名事宜進行公證行爲(見卷宗第1089頁)。

同日，檢察院向法務局發出第456/2007/KL-NIC號公函，要求法務局局長採取緊急措施，禁止就A和B在包括上指三間公司的十間公司的轉名事宜進行公證和登記行爲(見卷宗第1090和1091頁)。

該十間公司爲：F(國際)投資置業有限公司、G(國際)投資置業有限公司、H投資發展有限公司、I置業發展有限公司、J國際置業投資有限公司、K投資置業有限公司、C國際置業有限公司、D建築置業投資有限公司及E投資有限公司。

檢察院認爲有關措施屬偵查行爲而不屬扣押行爲，且該措施的目的在於由行政部門協助檢察院的偵查活動，以便查明兩名嫌犯是否曾利用有關公司實施犯罪，同時，不排除在查明事實以後，扣押涉及犯罪的財產等證據的可能性。

依照分權的職能原則，法院無意也不應質疑檢察院偵查措施的適宜程度。

然而，刑事訴訟的根本原則爲合法性原則。

在檢察院的第720/2007號偵查卷宗中，檢察院命令法務局禁止進行關於嫌犯A和B在十間公司的轉名的公證和登記行爲。

檢察院認爲，上述禁止措施不屬扣押行爲而僅屬要求行政當局協助的偵查行爲，故此，申訴人不得循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規定對有關措施提起申訴。

《刑事訴訟法典》在第一部份第二卷第三編第三章由第163條至第171條專

門將扣押列爲刑事訴訟中獲取證據的方法之一。

如前所述，檢察院聲明有關禁止措施不屬扣押方法。

然而，基於行政當局爲履行向司法當局提供協助的義務，可以預見，法務局將採取措施，禁止進行涉及嫌犯A和B在有關十間公司的轉名的任何公證和登記行爲。

客觀而言，以上措施必然限制嫌犯A和B處分其財產的權利。

然而，倘如檢察院理解，以上措施僅屬檢察院要求行政部門的協助偵查行爲，嫌犯不能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規定提出申訴，那麼，面對刑事偵查措施對其財產處分權施加的客觀限制，受影響嫌犯可以採取何種措施予以異議？

《基本法》第6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以法律保護私有財產權。

《司法組織綱要法》第 6 條第 1 款列明：*確保任何人均有權訴諸法院，以維護其權利及受法律保護的利益；不得以其缺乏經濟能力而拒絕公正。*

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37條、第245和第249條規定，檢察院在領導偵查活動的過程中有權採取查明事實真相的一切偵查行爲，然而，在第720/2007號偵查卷宗中，檢察院命令的禁止轉名的公證和登記行爲客觀上限制受影響嫌犯自由處置其財產的權利，故此，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條、第10條和《司法組織綱要法》第 6 條第 1 款規定，在尊重檢察院對法律的不同理解的前提下，本庭認爲，刑事起訴法庭對在刑事偵查過程中，針對的具體限制公民/嫌犯的財產權的禁止措施，受影響人仕應有權依《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6 款規定請求法院予以審議，因有關禁止措施實質上產生扣押嫌犯在有關公司所佔股的效果，倘公民在其財產權受限制而無法進行申訴，那麼，《基本法》規定的公民財產權受法律保護的規定將難以落實。

另一方面，《刑事訴訟法典》並無列明除扣押以外的禁止公民自由處置財產的偵查措施。

《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1 款規定，須扣押曾用於或預備用於實施犯罪之物件，構成犯罪之產物、利潤、代價或酬勞之物件，以及行爲人在犯罪地方遺下之所有物件或其他可作爲證據之物件。

在相關偵查卷宗中，檢察院認爲嫌犯A和B從事行賄和清洗黑錢的犯罪活動，並可能利用其名下公司轉移犯罪所得，故而經廉政公署建議，爲進一步收集證據而要求法務局提供協助，特別是查明疑犯A和B有否利用相關公司實施犯罪，且不排除於查明事實後，扣押涉及犯罪之財產(參考卷宗第1098頁檢察院的理由意見)。

在尊重檢察院立場的前提下，本庭認爲，檢察院在作出有關禁止命令時，認爲存在有關嫌犯利用有關公司轉移犯罪所得的可能性，然而，由檢察院的理由意見分析，以我們大胆的推測，至2007年4月18日檢察院向法務局發出禁止措施的命令時，檢察院僅對有關嫌犯曾否利用有關公司轉移犯罪所得存在懷疑且只是局限於一種可能狀態。

依照合法性原則，倘檢察院或法院在偵查活動中沒有命令扣押措施，那麼，公民的財產權將不受影響或限制。

在本申訴卷宗之中，檢察院並無提供有關嫌犯曾利用有關公司轉移犯罪所得的初步證據。

另一方面，《刑事訴訟法典》第 105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規定：

一、違反或不遵守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僅在法律明文規定訴訟行爲屬無效時，方導致有關訴訟行爲無效。

二、如法律未規定訴訟行爲屬無效，則違法之訴訟行爲屬不當之行爲。

《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6 款列明對檢察院批准命令或宣告有效的扣押可向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提出申訴。

本案中，僅申訴人B一人對檢察院的禁止措施提出申訴，爲此，由申訴措施的正當性而言，本庭目前將僅就有關被申訴的禁止措施涉及申訴人B的效果予以

審議，爲此，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1 款和第 6 款規定，本庭認爲，檢察院在第720/2007號卷宗命令禁止就申訴人B對有關十間公司進行轉名公證和登記行爲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1 款規定的扣押要求，爲此，本庭宣告有關禁止措施不應產生《刑事訴訟法典》規定的扣押效果。

作相應通知，倘無上訴，待本批示生效後，去函法務局以便宣告本卷宗第1090至1091頁的禁止措施不能產生法定禁止效果。

將本批示送交檢察院檢閱。

.....」(見載於案件卷宗第 1099 至 1101 頁的批示內容)。

檢察院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並在上訴狀內總結和請求如下：

「.....

1. 對於檢察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7條、第42條、第245條、 第247條和第249條之規定作出之非屬扣押之偵查措施，嫌犯不得向刑事起訴法庭法官“申訴”，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亦無權受理和審議該“申訴”。
2. 在本案中，不存在檢察院命令作出的扣押，因而嫌犯不得依《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6 款之規定，向刑事起訴法庭法官閣下提出“申訴”，刑事起訴法庭法官閣下也不應依前述規定受理和審議該“申訴”。
3. 本案不存在申訴的前提，因此，刑事起訴法庭法官閣下的批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6 款之規定。
4. 刑事起訴法庭法官閣下的批示“解決”了對非扣押行爲的“申訴”，超出了其職權範圍，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250和251條之規定。
5. 基於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6 款、第250和251條之規定，刑事起訴法庭法官閣下之批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e項規定

之不可補正之無效。

6. 刑事起訴法庭法官閣下無權審理了屬檢察院權限之偵查行爲，亦違反了審檢分立訴訟原則，以及《基本法》第83條和第90條關於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履行職能的規定。

7. 即使不認爲刑事起訴法庭法官閣下的批示存在上述不可補正之無效，該批示至少也錯誤地適用了《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6 款之規定。

因此，澳門中級法院應當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和第109條之規定，宣告本上訴所針對之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之批示無效，並根據該法典第 22 條第 3 款之規定，命令將第720/2007-G號扣押申訴卷宗歸檔，或以錯誤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6 款之規定爲由廢止該批示。」(見載於案件卷宗第1105至1106頁的內容)。

就這上訴，B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403 條第 1 款的規定，作出了答覆，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詳見載於卷宗第 1108 至 1115 頁的葡文上訴答覆書內容)。

案件卷宗上呈後，駐本院的尊敬的助理檢察長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 406 條的規定，對之作出了檢閱，並發表下列意見書，認為上訴庭應裁定上訴理由成立：

「在本案中，檢察院不同意尊敬的刑事預審法庭法官於 2008 年 2 月 15 日就嫌犯 B 提出的申訴所作的決定，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我們同意檢察院司法官在其上訴理由闡述中所提出的觀點和理據，認爲該上訴理由成立。

從案卷資料可知，檢察院在案件調查過程中認爲嫌犯A及B涉嫌從事行賄及清洗黑錢犯罪，並有可能利用彼等名下的公司轉移犯罪所得，因此在廉政公署

建議之下並“爲進一步收集證據(特別是查明嫌犯A及嫌犯B有無利用相關公司實施犯罪，不排除於查明事實後，扣押涉及犯罪之財產等證據之可能性)”，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7條、第42條、第245條、第247條及第249條之規定，決定致函法務局要求採取緊急措施，禁止對相關公司涉及上述嫌犯之任何轉名事宜進行公證及登記行爲。

嫌犯B就檢察院的上述批示以《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6 款的規定爲依據向刑事預審法官提出申訴。

刑事預審法官受理了該申訴，認爲檢察院命令禁止進行有關公證及登記行爲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1 款規定的扣押要求，因此“宣告有關禁止措施不應產生《刑事訴訟法典》規定的扣押效果”。

在尊重刑事預審法官所作決定的前提下，我們對該決定不能表示認同。

檢察院一直認爲，在本案中作出的禁止進行有關公證及登記行爲的決定並不屬扣押行爲，而是一般偵查措施。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的相關規定，檢察院具有促進刑事訴訟程序的正當性，並領導刑事偵查，有權採取爲調查犯罪是否存在、確定其行爲人及其責任，以及發現及收集證據，以便就是否提出控訴做出決定而必需的一切措施，除非法律規定必須由預審法官作出、命令或許可的行爲(參見《刑事訴訟法典》第250條及第251條的規定)。

眾所周知，扣押可由檢察院以批示許可或命令進行，甚至在特定情況下可由刑事警察機關進行，由檢察院宣告有效。

同時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6 款的規定，對檢察院許可、命令或宣告有效的扣押，可向預審法官提出申訴。

但是在本案中，十分明確的是檢察院從未就嫌犯的相關公司作出任何扣押的決定，而只是要求法務局予以協助，不進行與這些公司轉名有關的公證及登記行爲，以便廉政公署查明嫌犯A及B之犯罪與這些公司的關係。

另一方面，我們對公司是否可以成爲扣押的對象也存有疑問。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1 款的規定，扣押是針對“曾用於或預備用於實施犯罪之物件，構成犯罪之產物、利潤、代價或酬勞之物件，以及行爲人在犯罪地方遺下之所有物件或其他可作爲證據之物件”。

由此可見，扣押的對象是“物件”(objectos)，其包含的範圍雖然很廣，包括物品、書信、有價物、金錢等等，但考慮到公司的特殊性，我們對其能否成爲扣押的對象持保留態度。

不同的情況是公司的賬戶或財產，如果有證據顯示公司帳戶用於犯罪或其財產來自犯罪所得，則符合第 163 條第 1 款的規定，應該進行扣押。

因此，嫌犯B提出申訴的前提並不存在。

我們同意預審法官在其被上訴的批示中提出的禁止就公司轉名事宜進行公證及登記行爲在客觀上限制了嫌犯處分財產自由的說法，但這是否就意味著因此而將該措施視爲扣押呢？

另一方面，即使接受以保障公民的財產權利以及財產權受限制時的申訴權利爲由，並基於《刑事訴訟法典》並無規定除扣押以外的禁止公民自由處置財產的偵察措施，因此應該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條的規定類推適用對扣押提起申訴的相關規定的理解，我們也不能同意尊敬的預審法官作出的被上訴決定。

在其被上訴批示中，預審法官基於檢察院作出相關決定時的理由而推測“檢察院僅對有關嫌犯會否利用有關公司轉移犯罪所得存在懷疑且只是限於一種可能狀態”，並指出“在本申訴卷宗之中，檢察院並無提供有關嫌犯曾利用有關公司轉移犯罪所得的初步證據”，因此認爲檢察院採取的措施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1 款規定的扣押要求，對此我們不能認同。

這裡涉及到證據的問題。

我們認爲，僅以“申訴卷宗之中”所載有的證據材料來審理本案涉及的問題顯然並不足夠，因爲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7 款的規定，對扣

押的申訴是分開提出的，並且是由利害關係人提出，法律並沒有規定檢察院需於該申訴卷宗中提交證據以便預審法官進行審理，況且所有的證據材料均載於主案卷中，預審法官應綜合考慮所有的證據材料而不僅僅是載於申訴卷宗的材料來作出決定。在本案中，預審法官亦並未要求檢察院提供證據材料。

其次，在偵查階段，包括對於扣押條件的規定，立法者並沒有要求、也不可能要求檢察院在已查清所有事實並有足夠證據的基礎上才採取相應的措施，因此在這種“可能”的情況下進行扣押(或其他措施)是法律所接受的。

即使是採取羈押措施或提出控訴的情況，立法者所要求的亦只是“強烈跡象”或“充分跡象”。

在本案中，檢察院指出在第720/2007號偵查卷宗中有跡象顯示嫌犯A及B涉嫌從事行賄及清洗黑錢犯罪，並有可能利用彼等名下的公司轉移犯罪所得，因此有理由採取措施禁止進行相關公司轉名的公證及登記行爲。

綜上所述，我們認爲，即使是受理嫌犯B提出的申訴，亦應裁定其申訴理由不成立，予以駁回。」(見卷宗第1139至1140頁的內容)。

隨後，主理本上訴案的裁判書製作人對卷宗作出初步審查，而本合議庭的其餘兩名助審法官亦相繼對卷宗作出檢閱。

之後，本合議庭對原裁判書製作人提交的有關建議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的合議庭葡文裁判書草案，進行評議。

鑑於該草案並不獲合議庭通過，現須透過由第一助審法官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7 條第 1 款的規定、按照合議庭大多數意見所持的方案而繕立的本裁判書，對本上訴案作出裁決。

二、 本上訴裁判書的判決依據說明

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第 249 條的規定，「檢察院依據以下各條之規定及受當中所載之限制，作出實現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款所指目的所需之行爲，並確保實現該等目的所需之證據。」

換言之，作為刑事偵查的領導者(見《刑事訴訟法典》第 246 條第 1 款的規定)，檢察院有權決定採取或下令採取各種各樣的措施，以「調查犯罪是否存在、確定其行爲人及行爲人之責任，以及發現及收集證據，以便就是否提出控訴作出決定」(見《刑事訴訟法典》第 245 條第 1 款的規定)，祇要不涉及《刑事訴訟法典》第 250 條和續後條文所專屬保留予刑事預審法官的權限便可。

就本偵查卷宗而言，檢察院曾發函澳門法務局，以要求禁止就涉案各公司的所有權或股份的任何移轉事宜進行公證及登記行為。

雖然這措施在客觀上會導致有關公司的所有權或股份不能移轉予他人，但在本上訴案中，經分析被上訴的批示內容和其內所述的案情後，本院認為如刑事預審法官本人在該批示中表明上述檢察院的禁止措施非屬《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所泛指的真正扣押行為，而祇是會在「實質上產生扣押嫌犯在有關公司所佔股的效果」，那他便不得假借《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 條第 6 款的規定，去具體審議該舉措的合法性或避重就輕地「宣告有關禁止措施不應產生《刑事訴訟法典》規定的扣押效果」。

事實上，刑事預審法官僅在刑事訴訟法律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才可介入由檢察院主導的偵查行為(見《刑事訴訟法典》第 11 條和第 250 條的規定)。

據此，本院得廢止今被上訴的批示，即使以有別於檢察院在上訴狀內 所主張的具體理由亦然。

三、 判決

基於上述依據，**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檢察院的上訴請求成立，廢止被上訴的批示。**

被上訴人B須支付其聲請所引起的所有訴訟費，包括本案在刑事起訴法庭時的7個司法費用計算單位的司法費和在本上訴審級的8個司法費用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把本決定知會法務局。

澳門，2008年7月10日。

第一助審法官
陳廣勝

第二助審法官
賴健雄

本案主理法官
José Maria Dias Azedo（司徒民正）

(Vencido. Segue declaração de voto)

Processo nº 220/2008

(Autos de recurso penal)

Declaração de voto

Como relator dos presentes autos, e afigurando-se-me que censura não merecia o despacho objecto do presente recurso, elaborei projecto de acordão onde propunha a sua confirmação.

Vencido que fiquei por não me parecer de subscrever o entendimento dos meus Exm° Colegas, passo a expor como me preparava para decidir, acompanhando de perto o referido projecto.

1. No âmbito dos Autos de Inquérito n° 720/2007 que corre os seus termos no Serviço de Acção Penal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e por ofício datado de 18.04.2007 dirigido à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Assuntos de Justiça, solicitou o Exm°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a não realização de qualquer acto notarial e de registo relacionado com qualquer tipo de transacção e alienação de quotas pertencentes a 10 sociedades comerciais melhor identificadas nos autos e das quais são sócios **A** e a sua esposa **B**; (cfr., fls. 1090 a 1091).

*

Oportunamente, invocando o preceituado no art. 163°, n° 6 do C.P.P.M., impugnou a referida **B** a dita "decisão" do Dign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cfr., fls. 5 a 9), vindo o Mm° Juiz de Instrução Criminal a proferir despacho onde declarou a mesma decisão ilegal, (por inobservância do estatuído no referido art. 163°, n° 1), julgando assim procedente a apresentada impugnação; (cfr., fls. 1099 a 1101)

*

Inconformado com o assim decidido, traz o Dign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o presente recurso, onde, em síntese, afirma que a sua decisão não configura uma "apreensão", em causa não estando assim o preceituado no art. 163° do C.P.P.M., e sendo antes de se considerar a sua decisão um "acto praticado em sede de Inquérito", incompetente era o Mm° JIC para o apreciar; (cfr., fls. 1104 a 1106).

2. Após a necessária ponderação sobre o teor do despacho recorrido assim como dos motivos pelo ora Recorrente invocados para pedir a sua revogação, mostra-se-nos que nenhuma censura merece aquela decisão, (necessárias não nos parecendo grandes elaborações ou considerações).

Vejamos.

É verdade que os presentes autos se encontram na fase de Inquérito, e, como se preceitua no art. 246° do C.P.P.M.:

"1. A direcção do inquérito cabe ao Ministério Público, assistido pelos órgãos de polícia criminal.

2. Para efeitos do disposto no número anterior, os órgãos de polícia criminal actuam sob a directa orientaçã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e na sua dependência funcional."

Por sua vez, é também verdade que nos termos do n° 1 do antecedente art. 245° do mesmo código:

"O inquérito compreende o conjunto de diligências que visam investigar a existência de um crime, determinar os seus agentes e a responsabilidade deles e descobrir e recolher as provas, em ordem à decisão sobre a acusação."

Porém, há que ter em conta que, (como em tudo na vida), há limites...

O facto de ter o Ministério Público a "direcção do inquérito", e no âmbito desta fase processual caber ao mesmo Órgão a realização de um conjunto de diligências previstas (genéricamente) no transcrito art. 245° do C.P.P.M. não implica que se considere a sua acção insusceptível de fiscalização mediante impulso processual dos sujeitos processuais com aquela afectados, nomeadamente, pelo Juiz de Instrução Criminal, e, em especial, quando aquela atinja os seus direitos pessoais ou patrimoniais.

E dito isto, que nos parece evidente, (pelo menos, no âmbito da vigente Lei processual penal e numa sociedade que se quer juridicamente ordenada), não se pode deixar de consignar que, se bem ajuizamos, até se nos mostra algo surpreendente a posição pelo Exm°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assumida na sua motivação de recurso.

Especifiquemos, ainda que abreviadamente.

Quanto ao facto de não ser o pedido feito à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Assuntos de Justiça uma “apreensão”, cabe dizer que, de facto, não foi tal expressão utilizada no ofício atrás referenciado, nem tão pouco no despacho que o antecedeu; (cfr., fls. 1089).

Contudo, cremos que inegável é que o mesmo pedido, (ainda que sem indicação de qualquer base legal), não deixou de produzir os mesmíssimos efeitos de uma “apreensão”, já que, com base no dito “pedido”, foram efectivamente recusados actos de registo referentes às sociedades em causa, (não me parecendo também que não tenha o Mm° J.I.C. considerado o mesmo uma “apreensão” – como o entendem os meus Exm°s Colegas – pois que, a nosso ver, é o que resulta da própria decisão proferida e recorrida, onde, aliás, é tal expressão repetidamente utilizada).

E assim sendo, (e independentemente do demais), ocioso é elaborar-se sobre a “natureza” da medida em causa, (até porque nem sequer nos é sugerido em que possa a

mesma consistir).

Aqui chegados, e dúvidas não havendo que verificados não estão os pressupostos do art. 163° n° 1 do C.P.P.M. – onde se prevêm os pressupostos para a "apreensão" – evidente é também que a única solução que se nos mostra acertada é a já adoptada pelo Mm° JIC.

De facto, não deixando de constituir a medida em causa uma "apreensão", (pelo menos, no sentido material), e certo sendo que prevê a Lei processual penal vigente a "impugnação" de tal medida perante o Juiz de Instrução Criminal, (art. 163°, n° 6 do C.P.P.M.), indiscutível é que tinha o Mm° Juiz autor do despacho recorrido competência para o proferir, e, assim, constatando-se que verificados não estão os pressupostos legais para que fosse ordenada a dita "apreensão", nada mais se nos oferece dizer que não seja decidir pela confirmação da decisão recorrida.

3. Nestes termos, julgava im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Macau, aos 10 de Julho de 2008

José M. Dias Azedo